

民俗與政治：

中國國民黨政權下的清明節再製（1912—2008）*

周俊宇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就讀於日本東京大學綜合文化學院

區域文化研究所（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班

* 本文根據筆者碩士論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部分內容改寫而成，研究期間承蒙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紀念石田浩教授臺灣研究獎、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獎助制度、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臺灣研究獎提供獎助，特此誌謝。

摘要

屬於東亞及華人社會共同文化資產之一的清明節，在中華民國的法定節日名稱為民族掃墓節。精確而言，清明節與民族掃墓節兩者相近但不相同，前者為一傳統節日，後者則是一個日期與前者同日，在中國國民黨政權觀點及政治運作下，揀選、結合清明節中符合自身政治意圖的要素，被創造出來的政治節日。蔣中正總統逝世後，國民黨緣於巧合，復出於刻意，又將同屬政治節日的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日之日期定在清明日，這使得清明此一傳統節氣，同時存在清明節、民族掃墓節及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日三個節日。

為了解明這個圍繞著清明節之政治利用的長期過程，本文基於官方文獻、政黨宣傳資料及機關刊物、報紙等史料，以1912年至2008年為研究上之時間斷限，對其歷史進行分析、論述，亦就其於現今臺灣社會留下的影響，以及目前中國政府的相關運用略作探討。此一個案研究，當於政治權力與傳統民俗之間互動過程的瞭解上有所助益。

關鍵字：清明節、民族掃墓節、祭黃陵、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日、中國國民黨。

壹、前言

清明最早為農曆二十四節氣之一。《曆書》中有關清明的解釋為：「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丁，為清明，時萬物皆潔齊而清明，蓋時當氣清景明，萬物皆顯，因此得名。」節氣反映太陽運行週期，在過去是一種用於輔助陰曆的曆法，對農耕步驟有重要的提示作用。至於清明節，則是日後以此節氣為基礎發展而成的節日，與除夕、端午及中秋等依據陰曆的傳統節日不同，是少數以現行的格里曆（Gregorian calendar）換算後，日期仍大致固定的節日。

清明雖然是東亞或華人社會共有的節日資產之一，但它作為臺灣現行中華民國國定節日之一，則有一個特別的法定名稱即民族掃墓節，日期規定在農曆節氣清明日。另一方面，2007年廢除的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日也定於此日。簡而言之，一個節氣日期，同時存在著三個節日。

精確來說，民族掃墓節並非傳統節日，而蔣中正的逝世紀念日與清明同日，也不是一種出於純然的巧合。有關這樣一個黨國體制在臺灣社會留下的痕跡，在過去的政策與宣傳影響下，一般民眾似乎模糊地對其因果關係略有瞭解，卻未必真正認識這個多重關係被建立的過程。有鑑於此，本文將以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一個較長的時間斷限，觀察此一傳統節日在近代中國乃至於戰後臺灣中發生的再詮釋、再創造過程。2000年至2008年民主進步黨執政期間，對過去黨國體制下政治象徵的反思及批判，亦納入研究範圍。至於同一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的作法，也將作略述，作一參考對照。

貳、國民政府時期民族掃墓節的制定

清明節歷史悠久，由於它滿足了常民祭祖、春遊及農耕等倫理需求及作息規律，因此發展成為一個文化氣息充分的傳統節日。中華民國成立後，特別是即使國民政府完成北伐統一後，採取了禁用農曆、舊曆，

以陽曆為國曆的政策，屬於舊曆節日之一的清明節仍因其特性符合政權所需，而被施以一定的改造以符所用，例如於此日制定民族掃墓節及結合祭黃陵儀式等。此一黨國體制下的「優遇」，使清明節顯得較其他傳統節日更加重要。

一、定清明為民族掃墓節：從常民習俗到政治節日

原為二十四節氣之一的清明，起初並不被意識為一個節日。中國某些地區雖然在唐代以前就有於清明時節上墳祭祖的現象，但這跟其他時節的祭祖相同，尚未形成節日的規模、氣氛及禮俗傳統，因而還不能稱為節日。相對地，早在唐代以前，社會上就普遍流傳著寒食節。寒食節一般從清明前一二日開始，歷數日而終，唐代官方制有寒食節假期，並發展出於寒食期間掃墓的習俗。作為節氣的清明則包含在假期之中，此時已有將清明意識為節日的端緒。且唐代寒食禁火三日，而清明標識著寒食的結束、熟食的開始，因此百姓選擇於清明上墳，以使用火焚燒紙錢。另外，寒食節假期為人民提供統一的娛樂時間，因此百姓在上墳祭祖之餘，也趁機踏青遊樂，形成普遍的春遊活動。

至於上巳節，原來在舊曆中指三月第一個巳日，後來固定在3月3日，此一節日在初春舉行，自古即有祓禊、求子、春遊等風俗，由於此一節日日期亦與清明相近，這些風俗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便為清明節所吸收。另外，這一天尚有三月節或古清明之稱，例如在清代以來的臺灣漢人社會中，便有泉州人於清明節掃墓，漳州人在三月節或古清明上墳，而客家人則於元宵過後至清明期間擇日祭祖的說法。¹

總而言之，唐代以前不存在清明節，唐宋時期清明節是寒食節一個部分，而元代以後寒食風俗漸趨消亡，寒食節便成為以清明為中心的節日，逐漸演為清明節。清明節可說是寒食節發展的結果，此一節日在發展過程中又融合上巳節踏青遊樂的內容，在明代以後就成為一

1 陳正之，《臺灣歲時記——二十四節氣與常民文化》（臺中市：行政院新聞局中部辦公室，民國86年3月初版），頁60；〈閒話清明〉，《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3年4月8日，版6；閻健，〈掃墓械鬥 漳泉先民分開祭祖〉，《聯合報》民國86年4月4日，版17。

個以上墳祭祖及踏青遊樂為特色的民間節日。²

民國以後，清明節歷經了一段政治化的過程。1915年，北洋政府接受孫中山建議，定清明為掃墓節。³廣州國民政府在北伐完成前也定農曆清明為植樹節，至1928年在南京盛大舉行孫中山總理逝世紀念及植樹式後，同年4月7日國府令：「永以為例，嗣後舊曆清明植樹節應改為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所有植樹節應即廢止，清明節各機關照常辦公。」這項命令除為尊崇總理起見外，要求全國上下停止使用農曆，也是政策思維之一。⁴

在國民黨官員張繼、邵元冲等人提倡之下，1934年國府開始派員至咸陽周陵、興平茂陵掃墓，⁵翌年，國府宣布為提高民族意識尊崇祖賢起見，定每年清明日為民族掃墓節。⁶當日，國府方面由鄧家彥代表主席林森，黨中央則派邵元冲、張繼代表前往陝西西安黃帝陵、周文王武王陵墓致祭，並順道至西北視察。邵氏臨行前曾向記者表示：「民族掃墓節係養成人民崇仰祖先提高民族意識，用意至深。」⁷

綜觀此一時期的官方活動，這個節日的意義主要在祭掃歷代帝王陵墓，發揚民族精神。這從參與祭掃甚力的鄧家彥，其於1937年適逢民族掃墓節舉行的總理紀念週報告中可以見得：

這「民族掃墓」是個什麼意義呢，簡直的說，就是那些有大勳勞於我們民族的聖帝明王，如黃帝、漢武帝、唐太宗、明太祖等，名臣賢將如岳飛、戚繼光等，我們讀過他們的歷史，十分崇敬他們，現在表一表追遠之意，代表全體民

2 有關上述傳統民俗節日的起源、變遷的討論，請見：楊琳，《中國傳統節日文化》（北京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頁211 - 232；黃濤，〈清明節的起源、變遷與公假建議〉，收入中國民俗學會、北京民俗博物館（編），《節日文化論文集》（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頁44 - 45；劉魁立（編），《中國節典：四大傳統節日》（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頁59 - 96。

3 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頁258。

4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令第142號：〈「嗣後舊曆清明植樹節應改為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所有植樹節應即廢止清明節各機關照常辦公」〉，《國民政府公報》47期，民國17年4月，頁10 - 11。此段引文標點為筆者所加。

5 〈民族掃墓節 戴等在周陵茂陵植樹〉，《中央日報》民國23年4月5日，張1版2。

6 〈下月六日之首屆民族掃墓節〉，《中央日報》民國24年3月23日，張1版2。

7 〈鄧家彥邵元冲昨赴陝 主持民族掃墓節〉，《中央日報》民國24年4月1日，張1版2。

族，去祭掃他們的陵墓，尤其是當此國難嚴重的時候，我們應當常常念著我們的先輩是如何奮鬥，如何抵抗外侮，保衛國土，我們做後輩的，應當如何努力，繼承他們的遺志，保持他們光榮的歷史，以期綿延我們民族的生命，這纔是民族掃墓的真意義。⁸

1928年年末國府完成北伐，名義上統一中國後，仍面臨不斷發生的內亂和外患。在內憂方面，中國共產黨是國民黨的競爭對手，他們於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蘇維埃政權走另外建國的路線，在國民黨長期圍剿下仍「長征」至陝西延安，直到1937年才展開檯面上的國共合作。⁹此外，國民黨內部亦政爭不斷，不僅有黨內左派以民主號召，結合失意政軍人士反對南京政府，亦有國民革命軍中非蔣系軍隊被壓抑，導致1930年間的中原大戰。¹⁰在外患方面，有日本軍國主義人士在1931年9月18日發動「九一八事變」，占據東北三省，開啟大規模對華侵略的序幕等新情勢。¹¹與官方於同時期重新發起祭孔、制定孔誕的背景相同地，作為力求以提倡民族復興，化解戰亂期間國內外眾多矛盾的對策之一，在內政禮制上定清明為民族掃墓節亦成為一個在儀式政治上的作法。並且，配合該節日遠赴西北致祭黃陵本身，在返回民族起源神話聖域朝聖的象徵意義之外，也有開發西北充實邊疆，在列強環伺下鞏固國族邊界的時代意義。¹²

比較當時報導所見和後來國民黨政權遷臺後的發展，其時官方定清明為民族掃墓節並非意味著規定人民統一於當日掃墓，主要焦點是在祭掃黃陵、周陵、秦陵、茂陵、昭陵等歷代帝王陵之官方儀式，視此節日、活動可達到「全國萎靡風氣，為之一振，民族復興之先聲」

8 〈民族掃墓節感言 鄧家彥昨在國府報告〉，《中央日報》民國26年4月6日，張1版4。

9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7月2版），頁217、304。

10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頁224。

11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頁250。

12 沈松僑，〈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歷史學報》37期（2006年6月），頁183 - 185。

的效果。¹³

國府雖定清明為民族掃墓節，但政策上並未規定休假，且民間掃墓的習俗也不必然都在清明這一天進行，不同族群亦可能有不同習慣，也就是說，民間作息是較自由的。1936年官方甫制定民族掃墓節時，《中央日報》曾有一篇署名瘦秋的投書，呼籲中央不要只定清明為民族掃墓節，更應定為民間掃墓節，令民眾也在這天去祭掃先人的墳墓，其餘所有革命先烈的祭典和為國殉難人員的春祭，也都改在當日舉行。¹⁴

大體而言，這個階段的民族掃墓節究其內涵，是官方在民俗節日同日期制定一新節日，利用祭祖傳統及慎終追遠觀念，以儀式政治意圖呼籲、達到某種程度的國家整合，而非意味國府制定一個新節日來影響常民習俗。

二、祭黃陵：從皇權象徵到民族共祖

（一）黃帝形象在近代中國的轉變

雖然官方在民族掃墓節當日並非只祭黃陵，而是由各地黨政官員主導祭祀歷代帝王英雄，但無論是在中國大陸時期或是遷臺以後，當日最重要的官方儀式仍非祭黃陵莫屬。國府定清明為民族掃墓節後，祭黃陵就成為官方每年於節日中必行的常態儀式。至於，為何祭黃陵成為官方於民族掃墓節中舉行的主要儀式，其因實與黃帝在中國大陸上的政體從君主國家邁向民族國家（nation-state）過程中的形象轉換有關。

根據沈松僑的研究，王莽篡漢後首立「黃帝太初祖廟」，唐代宗朝更於今陝西黃陵縣置廟，至明清一代祭祀更為隆重。歷代皇權祭祀行為之目的，乃在於建立一套虛擬性的「政治血緣」（blood of politics），使黃帝成為皇室專屬的世系祖源。對官方而言，至少在十九世

13 西安通訊，〈黃陵周陵等修葺完竣 今日舉行民族掃墓禮〉，《中央日報》民國25年4月5日，張2版2。

14 瘦秋，〈清明宜定為 民族掃墓節〉，《中央日報》民國25年4月5日，張3版1；瘦秋：〈關於民族掃墓節〉，《中央日報》民國25年4月6日，張3版1。按此文作者在起初投書將欲呼籲的「民間掃墓節」誤植為「民族掃墓節」，隔日他又再度澄清前文題目之誤。

紀中期以前，黃帝大體上是政治權威「皇統」的象徵之一。然而，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官式的「黃帝」論述結構卻產生變化，脫離舊有帝王世系的「皇統」脈絡，轉為納入民族傳承的「國統」脈絡中。¹⁵

對於此一國族近代建構論的見解，歷史學者王明珂在其基礎上，整理古代文獻史料及華夏邊緣民族譜系資料，論證這種建構過程在戰國以降實已有之，它基於一種普遍的心理與社會過程——攀附——在「血緣」記憶或想像上可與黃帝聯繫上的人群逐步往政治地理及社會性等兩種華夏邊緣擴張。而晚清知識份子的國族建構則是這個承自古代歷史與記憶基礎之過程的最新階段，使這種認同不僅是繫於某一統治族群或是宗族、家族，而是與每一個中國人繫上想像的血緣關係。¹⁶

晚清時期，在以漢族為主的革命運動中，推翻清朝除卻反專制求共和之外，同時還有驅逐異族的種族革命意涵。在這個階段，黃帝是作為漢族共祖來被崇拜的。黃帝西來說就是一顯著事例。在法國學者 Terrien de Lacouperie 於 1894 年被出版的遺著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B.C. to 200A.D.* 中，以古中國文明及巴比倫文明相似處，指出中國漢族源起古代巴比倫 Bak Sings 族，而漢族的始祖黃帝 (Huangdi) 則是其首領 Kudur Kakhunti 之訛。此一說法稍晚在日本及中國知識界及革命派的轉介、加工之下，造成一時轟動。這種漢族是來自西方之征服種族的說法，被許多反清革命份子理解為強勢、優位之意，為驅逐滿人的少數統治提供了人種學上的依據。¹⁷ 在晚清革命份子訴求推翻異族統治，建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黃帝作為漢族始祖的象徵意義顯得更具正當性。1908 年，號召革命的同盟會成員，便曾以祭祀黃陵表達「驅除韃虜」的國族主義情緒。¹⁸ 此一單一種族的象徵，在民國成立後，由於原則上避免過度強調唯有漢族的民族

15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收入盧建榮（編）：《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中國新文化史》（臺北市：麥田出版，2001年11月27日初版），頁289 - 290。

16 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本3分（民國91年9月），頁586 - 587。

17 石川禎浩，〈20世紀初頭の中國における“黃帝”熱—排滿・肖像・西方起源說—〉，《二十世紀研究》3號（2002年12月），頁12、17。

18 姚敏傑、何炳武（編注），《黃帝祭文集》（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頁33 - 37。

主義，黃帝也在民國標榜五族共和的口號下，轉變形象成為曖昧的中華民族共祖。¹⁹相傳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便曾委派代表致祭黃陵，並留下「中華開國五千年，神州軒轅自古傳。創造指南車，平定蚩尤亂。世界文明，唯有我先。」等詩句傳世。²⁰

在科學史學的觀點下，黃帝雖未如早期研究對過去文獻的解讀中，被視作上古時代真實存在的部族領袖，而被當作是虛構、想像、層累造成的神話人物，²¹但中華共祖、炎黃子孫等辭彙仍時常在今日各種國族主義感性呼告的文類中出現，成為一種文學意味較重的修辭。總而言之，黃帝作為中華共祖的形象，並非一個不證自明的存在。在建構的過程中，它緣於歷史、文化、政治、地域等因素的積累，自眾多遠古人物中脫穎而出。

（二）國民政府時期的祭黃陵

原為清廷官僚的袁世凱，在執政時期對此一符號並不欣賞。1913年任民國首任大總統的袁世凱，1914年冬至在北京南郊天壇舉行仿前朝皇權祭祀之風，同時也被認為是其走向帝政象徵之一的祭天儀禮。²²根據當時《祭天案審查報告書》中政治會議討論配位問題時的記載：「揆之共和國體，必應以國民全體信仰之人，始稱其位，而以祖為配之說已為狹義。就黃帝而論，五族人民是否多為其後，眾說不一。非一時所能確定，擬請配天一節，暫從緩議。」²³此外，從袁政權時期政事堂禮制館所編各種禮制書籍，有《祀天通儀》、《祭祀冠服制》、《祭祀冠服圖》、《祀孔典禮》、《關岳合祀典禮》、《忠烈祠祭

19 石川禎浩，〈20世紀初頭の中國における“黃帝”熱—排滿・肖像・西方起源說—〉，頁2-3。

20 陝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等（編），《黃帝與黃帝陵》（西安市：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頁112-113；張豈之（編）：《五千年血脈——黃帝及黃帝陵史料匯編》（西安市：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頁181。

21 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頁584。

22 妹尾達彥，〈帝國の宇宙論——中華帝國の祭天儀禮〉，收入水林彪等編，《王權のコスモロジー》（東京都：株式會社弘文堂，平成10年4月），頁250。

23 〈祭天案審查報告書〉，收入《孔教會雜誌》1卷10號（民國3年），轉引自李俊領：《中國近代國家祭祀的歷史考察》（濟南市：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4月20日），頁134。

禮》、《相見禮》等，但未見祭黃陵的儀禮規範。²⁴過去作為歷代皇權祭祀對象之一，晚清時期又被漢族革命運動當作圖騰來使用的黃帝，在袁世凱政權似乎對其是否適合作為五族共和的象徵，持保留態度。

民國以來，祭黃陵中斷數十年，直到國府制定民族掃墓節，才重開制度性祭祀。祭黃陵雖非當日唯一祭儀，但卻是最具代表性的。1935年國府正式定清明為民族掃墓節，在致祭代表動身往赴陝西前，邵元冲談及掃墓意義時，謂黃帝為中國歷史代表人物，精神與事業皆為民族表率，在內憂外患國事多艱之秋，吾人亟應效法偉大精神，共赴國難。此外亦表示對西北應加以開發。鄧家彥則表示，黃帝戰蚩尤於涿鹿，發明指南針等文明，非僅是中國的民族始祖，亦為民族文化創造者，亦因黃帝是革命的創造者，因此國人應當紀念，反對者云民族掃墓是復古，乃是最大錯誤。²⁵

國府派員祭掃的黃陵，位於今中國陝西黃陵縣城北橋山，這場儀式實際上於該年清明翌日的4月7日上午開始，官方在陵前搭建三座大廳規模的彩棚，中設祭桌陳列祭品，陵旁古柏、古松貼遍寫滿謁陵意義的口號標語。報導稱過去清制三年一祭，近20餘年來因國事多艱，當局者無暇顧及，使祀典久弛，如此盛大的舉行實屬空前創舉。黃陵祭掃結束後，代表們又至咸陽周文王陵、漢武帝茂陵等地祭掃，隨後到各地巡視。

《中央日報》連續數日連載此次西北之行祭黃陵的報導遊記，並介紹當地風土民情。²⁶此外也報導中國各地的黨政部門都於民族掃墓節期間舉行儀式，如：江蘇杭州市黨部瞻拜岳飛墓、湖南省府祭炎帝、

24 參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政事堂禮制館（編），《民國禮制七種》（北京：編者，民國3年至4年）。

25 中央社電，〈民族掃墓程序決定 邵鄧談掃墓意義〉，《中央日報》民國24年4月4日，張1版2。

26 西安通訊，〈中樞代表祭掃先陵之經過〉，《中央日報》民國24年4月15日，張1版2；西安通訊，〈黃陵祭掃記 民族掃墓第三函〉，《中央日報》民國24年4月16日，張1版3；〈黃陵祭掃記（續） 民族掃墓第三函〉，《中央日報》民國24年4月17日，張1版3；〈黃陵祭掃記（續） 民族掃墓第三函〉，《中央日報》民國24年4月18日，張1版3；〈黃陵祭掃記（續） 民族掃墓第三函〉，《中央日報》民國24年4月19日，張1版3。

虞帝陵等等。²⁷

關於致祭官員的感想，首先，張繼於4月21日接受專訪，表示西北是民族光榮歷史之所在，吾人必極力建設，以喚起國人認清中華民族過去榮光，使人人發揮民族自信力，國家方可永存於世界，此次民族掃墓的提倡，用意亦在於此，中央亦應作一具體決定，通令全國遵照。國人亦勿謂此事無關宏旨，蓋喚起民族精神、確立民族自信，共負救亡圖存之重任，即乎此耳。張繼舉義大利墨索里尼和德國希特勒，以羅馬及日耳曼古帝國榮光警惕國人救亡圖存之例，表示中國亦當如此。²⁸其次，5月6日於首次祭黃陵後舉行的總理紀念週上，鄧家彥報告祭黃陵觀感，他起先釐清了所謂的外界誤會：

此次當我們尚未出發赴陝之先，接到一個蒙古人自北平寄來的一封信，這信是給邵委員元冲和家彥兩人的，信上大意說，你們去掃黃帝的墳墓，是紀念漢族的老祖宗，固然不錯，但是中華民國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國家，漢族的老祖宗要去祭，那末其他各族的祖宗是否同樣要去祭呢，要是不然，五族共和，得毋有礙，這人以為黃帝僅是漢族的祖宗，所以有此疑問，其實黃帝不只是漢族的祖宗，實在是中華民國各民族的祖宗，……

鄧氏在報告中引述于右任《黃帝功德記》之考證，強調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祖宗，主張民族祖先崇拜的價值，以及開發西北地方的重要性。談話最後呼籲，應規定每年祭掃一次黃陵，因祖宗的墳墓若荒蕪，民族的印象也不能深刻，今後當籌款改善西北交通，使全國民眾便於前往，如此民族思想自然可以普及。²⁹

這一段澄清顯示，近代中國從君主國家過渡到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知識份子們所思考的國民統合問題仍然存在。晚清革命份子推翻異族君

27 中央社電，〈昨日民族掃墓節 杭市黨員瞻拜民族英雄墓 冀省市政府補行植樹典禮〉，《中央日報》民國24年4月7日，張1版2。

28 〈張繼昨返京談 民族掃墓意義重大〉，《中央日報》民國24年4月22日，張1版3。

29 〈祭掃黃帝橋陵後的觀感——鄧家彥在國府紀念週報告〉，《中央日報》民國24年5月7日，張1版3。

權統治時，訴求的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黃帝符號是被種族民族主義所使用的，民國成立後雖然意涵轉換為五族共和、中華共祖，唯仍是一種以漢族為中心的整合。歷史學者鄭欽仁曾引述日本學者平野健一郎意見指出，在民國革命後孫中山雖一方面顧及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主張「五族共和」，一方面在實質上又採漢族中心主義及「一民族一國家」觀念，對少數民族則以同化主義或民族融合主義態度臨之。³⁰這種整合，在歷史文化上擴大了過去以漢族政權為中心之文獻所累積下來的歷史記憶，排除或收編其他民族的祖源神話。

有趣的是，據王明珂研究，民國以來意欲建構所謂漢、滿、蒙、回、藏等民族「五族共和」論述的知識份子或政治人物，在漢族以外所訴求的其他四個大族，皆是在中古時期以後才進入華夏之域的部族，他們在歷史記憶的建構上較少攀附炎、黃為其祖源，這種強調「炎黃子孫」的中國國族概念也就難以得到這些民族的普遍認同，有別於傳統華夏之域南方或西南的部分地區。³¹在歷史記憶的認同基礎上如此，在現實的政治情勢中亦然。民國成立後周邊情勢不穩，蒙古、新疆、西藏和東北等地皆有俄、英、日等列強虎視眈眈，彼此角逐或與當地的分離獨立運動互通聲氣。³²例如在俄國支持下，外蒙古的獨立運動自民初起就以統合內、外蒙古成為一獨立民族國家作目標，最後更達成事實上獨立，對於中國國族的構成形成重大挑戰。³³此外，1930年代日本亦據東北扶植成立滿洲國，在滿蒙華北地區經營，加速侵華腳步。往後的情勢發展更是每下愈況了。

國府首次祭黃陵時，《中央日報》記者曾作以下感言：中國自民國以來，好似一個初入社會的青年，雖受折磨但意志始終未滅，仍向著自強自立道路走，在此時期只顧了事業經營，從未有還鄉掃墓的私念，現在雖達到還鄉掃墓心願，仍要想著這不是衣錦還鄉，而是忍痛

30 鄭欽仁，《歷史文化意識對我國政策之影響》（臺北市：業強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頁46 - 47。

31 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頁615。

32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頁83 - 96。

33 黃麗生，《蒙古意識與中國認同的糾葛：民初外蒙古獨立運動與內蒙古的反應》（臺北市：蒙藏委員會，民國91年6月初版），頁94 - 96。

含憂，在此情況下實應懺悔自勉。³⁴雖然，我們從推動者之一的邵元冲日記中可知，這件事務剛開始推動時，國府主席林森及于右任、戴傳賢等人，都對往赴陝西致祭一事以「畏寒」等理由推託猶豫，³⁵加以儘管這個五族共和的理想共和國圖式在建構過程中未必順利，但不能否認的是，國府在民族掃墓節期間皆由中央或地方官員致祭黃陵及其他歷代帝王陵墓，有一定程度的重視。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中正暫停剿共政策，與共產黨展開合作，共同抗日。這個契機促成了1937年國共雙方於談判期間合祭黃陵的實現，此後雙方於1938年、1939年又有合祭，其後均曾分別派員致祭。³⁶1938年合祭黃陵，也是中共高層張國燾與國民黨人士接觸，藉機投奔重慶國府陣營的舞臺。³⁷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日報》幾次祭祀活動報導中，對共黨參與之事全無提及，³⁸其餘使用中央社電的大報如《大公報》等亦未看到共黨參與的報導，³⁹相關記事僅在中共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新中華報》中可見。該報1937年的報導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特派代表致祭黃帝墳墓，向中華民族之始祖致敬，並表示誓死為抗日救亡之前驅，努力實現民族團結。⁴⁰或許國府是將共黨代表歸到所謂的「各界代表」中了。從這樣的報導策略，可以推知當時兩黨之間的從屬及競爭關係。

1945年對日戰爭勝利後，1948年由於國共內戰的白熱化，黃陵所在地已在共黨勢力掌握下，失去祭祀聖地的國府不得不在西安省府大樓遙祭黃陵。⁴¹1935年國府制定民族掃墓節以來，即使對日抗戰期間仍

34 〈黃陵祭掃記（續） 民族掃墓第三函〉，《中央日報》民國24年4月18日，張1版3。

35 邵元冲（著），王仰清、許映湖（標注），《邵元冲日記》（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頁1230 - 1231。

36 陝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等（編），《黃帝與黃帝陵》，頁115 - 116；張豈之（編），《五千年血脈——黃帝及黃帝陵史料匯編》，頁221 - 222。

37 丸田孝志，〈陝甘寧邊區の記念日活動と新曆・農曆の時間〉，《史學研究》221號（1998年7月31日），頁36；李俊領，〈中國近代國家祭祀的歷史考察〉，頁140。

38 京訊，〈民族掃墓節 國府將致祭明陵 張繼等今晨赴中部 明日舉行致祭橋陵〉，《中央日報》民國26年4月4日，張1版4；中央社電：〈民族掃墓節 照例舉行〉，《中央日報》民國27年4月2日，版2；中央社電：〈民族掃墓節 中央代表致祭黃陵〉，《中央日報》民國28年4月7日，版2

39 參考：中央社電，〈民族掃墓典禮隆重〉，《大公報》民國26年4月5日，張1版3。

40 〈蘇維埃代表林伯渠 參加民族掃墓典禮〉，《新中華報》1937年4月6日，版3。

41 中央社電，〈遙祭黃陵大典 今在西安舉行〉，《中央日報》民國37年4月5日，版2。

因黃陵位於大後方得以維持祭祀不輟，但1948年以後，國府僅能遙祭黃陵，這本是因應無法親至現場致祭的臨時舉措，不應為常態，然而日後隨著國民黨政權遷臺，就使得這個因戰事所致的權宜之舉成為常態。

參、戰後臺灣至90年代前的民族掃墓節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民族掃墓節在黨國體制下既有持續發展，亦有相應於臺灣此一新環境的變貌。首先，遙祭黃陵儀式於1950年恢復，其後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1972年由一般節日提升為國定假日，1975年蔣中正逝世後，因逝世紀念日定於清明舉行之故，又為此一節日帶來新面貌。至於其詮釋與內涵，過去「五族共和」不再被重視，復興基地不分本省、外省，反攻復國即是大孝盡忠等論調則時常被提及。蔣中正逝世後，在國民黨的塑造及蔣經國個人的演出下，清明祭祖的印象與紀念民族救星的氛圍則又時相重合。這說明臺灣社會邁向民主化的90年代以前，國民黨圍繞著清明節的政治利用是極為充分的。

一、臺灣光復致敬團與遙祭黃陵的恢復

二次大戰結束，國府接收臺灣後，1946年林獻堂等士紳曾籌組光復致敬團至中國大陸參訪，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祭黃陵。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臺以後遙祭黃陵的恢復，應始於前臺灣光復致敬團成員的建請。該團原成員是在1950年聯名上呈總統，請求規定臺省每年遙祭黃陵日期，以喚起同胞對民族遠祖的崇敬：

同人等生長臺島，欣逢乙酉光復，重歸祖國，曾組織臺灣光復致敬團，赴京陝祭黃陵孫陵，謁元首元輔，聊表敬祖敦本，崇德報功微意。值茲赴京陝致敬四週年之日，緬懷國族鄉邦前途，為加強民族意識，發揚民族精神，特聯名呈請規定臺灣全省每年遙祭民族遠祖黃帝陵日期，或於清明日民

族掃墓節，或於三月廿九日青年節，或於十月廿五日臺灣光復節，指定一日，屆期全省各縣市在就地忠烈祠設香案及民族遠祖牌位，向西北遙拜，由省縣市長、省縣市參議會議長主祭，各民眾團體學校代表參加，遙拜後，並向革命及抗日諸先烈拈香。此雖若末節，而富為國魂寓托，大足以提倡民族精神，消除外來邪說，行見鄭延平自力更生，不臣異族之大義永存；孫中山三民建國，掃除韃虜之精神不死。豈不懿哉！⁴²

此時，這個節日並非政府在相關法規中明定的國定節日，當然沒有硬性規定的官方紀念方式相應。雖然在國民黨以臺灣為反共基地、架構中國國家體制的局勢下，這項儀式的再恢復應該是遲早可以預期的，但是從它日後在臺的恢復程序及展現形式來看，也不能忽視臺灣光復致敬團在這之中的角色。

1951年4月5日，國民黨政權在臺首次遙祭黃陵，中樞暨省府先後在圓山忠烈祠舉行儀式，參加人員除機關首長外還有學生代表計1,600多人，禮堂設於忠烈祠正殿，正中置有「中華民族遠祖黃帝之神位」黃邊金字牌位，儀式簡單隆重。省府祭典9時起由省主席吳國楨主祭，北市長吳三連等陪祭。隨後中樞祭典開始，由內政部長余井塘代表總統主祭。⁴³

原臺灣光復致敬團成員並參與該年儀式的李建興，同期間在報上發表專文，講述清明節遙祭黃陵由來。他首先指出中央定清明為民族掃墓節，是由於黃帝乃中華民族始祖，因此作為黃帝子孫，應追念祖德祖功、使之不朽。接著，述及光復致敬團至中國大陸致祭的經過，表示因近兩年來局勢轉變，中央帶著一部分大陸同胞遷臺，「我們今天再想想大陸上黃帝的子孫們與黃帝陵、國父陵，是如何的情景，怎麼能把他們忘掉？」李氏在此文強調，臺人祖先來自中華本土，作為

42 中央社訊，〈緬懷華夏國魂 年年遙祭黃陵 臺光復致敬團呈總統 請規定每年遙祭日期〉，《中央日報》民國39年8月26日，版4。

43 本報訊：〈中樞暨省會各界 昨遙祭黃陵 余井塘代表總統主祭〉，《中央日報》民國40年4月6日，版3。

炎黃子孫的事實，任憑日本奴化教育也不會改變。現在從大陸遷入的同胞與臺人無異，亦為炎黃子孫，不過有先來後到之別爾爾。政府過去雖未能盡善盡美，但臺人不該數典忘祖、過於短視，只管對國事冷嘲熱諷，應當起而協助。⁴⁴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至今，遙祭黃陵成為一項固定的官方儀式，中樞和北市皆於圓山忠烈祠中舉行，省縣市首長也在各地忠烈祠祭祀。然而，只要與祭孔儀式稍加比較即可瞭解遙祭黃陵有其極限。首先，雖然同具「傳統」外觀，但祭黃陵是戰後國民黨自外攜來的「傳統」，未似祭孔存在臺灣社會已久。其次，臺灣既不存在黃陵，該政權亦未如建設國父紀念館般，試圖在此重建相關記憶場域，而是僅藉忠烈祠遙祭。最後，遙祭黃陵的內容單純而缺乏開放性，未如祭孔那般具有佾舞演出或民眾尋求提升學力的信仰支持。諸如上述因素，都使得這個失去聖地的遙祭在感染力上相形失色，相關報導也愈發形式化。⁴⁵

國民黨祭祀黃陵在中國大陸時期的政治象徵意義，在於藉儀式向國民宣揚中華民族多元同源的觀念。解嚴前政治環境相對安定的臺灣，不僅祭祀歷代聖王賢君的多種儀式退化到僅餘遙祭黃陵，甚至遙祭黃陵也只是極為單調的官方儀式。所謂多元同源的觀念不被強調，但清明習俗中慎終追遠的意涵，則被導向反共復國即是大孝盡忠、維護倫常等新的政治利用方向上。甚至，蔣中正1975年逝世後，其形象在黨國體制運作下，成為一個在現實上超越黃帝的至高偉人，從官方到民間，每逢清明所組織之謁陵、追思活動，其動員及影響程度遠勝於遙祭黃陵。

二、民族掃墓節的政治運用

(一) 國定節日體系中的位階提升

44 李建興，〈清明節遙祭黃帝陵的來由〉，《中央日報》民國40年4月6日，版4。

45 例如：本報訊，〈昨民族掃墓節 中樞遙祭黃陵〉，《中央日報》民國52年4月6日，版1；本報訊，〈中樞昨遙祭黃陵〉，《中央日報》民國68年4月6日，版3；綜合報導：〈中樞及省垣遙祭黃陵〉，《中央日報》民國85年4月5日，版2。

國民黨政權遷臺初期，1954年1月27日行政院發布的「紀念日（或節日）紀念辦法」，將民族掃墓節歸在「乙類紀念日（或節日）」項內，相對於規定休假的「甲類國定紀念日」，屬於不休假的一般節日。⁴⁶其時，已納入官方節日法規中的該節日尚非國定假日，然而就傳統節日而言，相較於其他節日仍較顯重要性。

1972年，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的時代背景下，內政部以「復興我國固有文化，崇尚倫理道德」，定民族掃墓節為國定假日，⁴⁷藉此與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傳統文化的否定、破壞作對比。該項政策以休假鼓勵民眾集中於民族掃墓節掃墓，使民間掃墓日程有往當日集中的趨勢，甚至原先於清明掃墓此一漢人習俗較無親近性的原住民族，在這一時期也開始出現於民族掃墓節休假期間祭祖的現象。⁴⁸

民族掃墓節次一階段的位階提升，就是與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日的結合。1975年4月6日，官方發布蔣中正總統於4月5日清明午夜11時50分逝世消息，⁴⁹內政部於5月15日依國民黨中央之提案，擬具「紀念先總統 蔣公辦法」，同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而後發布實施。⁵⁰有關逝世紀念規定，在該辦法第一項，定每年民族掃墓節（清明節）為「蔣總統逝世紀念日」，全國放假一天，並舉行紀念儀式。⁵¹1975年7月2日，嚴家淦總統正式明令宣布「以民族掃墓節（清明節）為 蔣總統逝世紀念日，為國定紀念日。」⁵²

1982年10月29日，內政部重新修正發布「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

46 臺灣社訊，〈各項紀念日節日 內部頒紀念辦法〉，《中央日報》民國43年4月21日，版3。

47 本報電，〈民族掃墓節 將放假一天〉，《中央日報》民國61年3月5日，版3。

48 羅素玫，〈都蘭阿美人的掃墓節：一個社會文化的變遷與轉換之探討〉，《東臺灣研究》5期（2000年），頁40 - 41；李碧勳，〈泰雅族三村 七月半集體掃墓：祭祖儀式中外合璧「原」味盡失〉，《中國時報》民國87年9月6日，竹苗社會新聞版18。

49 本報訊，〈全民哀痛·舉世同悲 總統蔣公昨夜逝世〉，《中央日報》民國64年4月6日，版1。

50 林美容，《中華民國現行紀念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之研究》（臺北市：內政部民政司委託計畫報告，1996年），頁13。

51 「總統府秘書長函『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先總統 蔣公逝世紀念』擬與恭謁光總統 蔣公陵寢合併舉行研處一案」（民國64年5月），〈總統 蔣公逝世紀念日案〉，《內政部檔案》，內政部藏，檔號：0065/B11802/12/0001/008。

52 中央社電，〈總統命令 蔣公逝世暨誕辰日 明定為國定紀念日〉，《中央日報》民國64年7月3日，版1。

法」時，民族掃墓節與其他春節、端午、中秋等民俗節日正式地作為國定假日，整合進節假法規中。這項規定一直沿用至今，甚至在2000年週休二日制全面推行，若干政治性節日取消放假後，民族掃墓節等攸關傳統慣習的民俗節日仍然保留休假。⁵³

（二）節日詮釋中的反共復國

在國民黨政權遷臺早期幾本有關節日來由與意義的通俗教育文本中，可以明顯看到一套未盡符實，卻能激勵民族意識的國族歷史建構痕跡，以及這套論述在現實政治中的運用。

例如1953年興漢出版社出版的《紀念節日手冊》中，關於民族掃墓節的由來如此敘述：紀元前4613年，中華始祖黃帝軒轅即位，為我們奠下許多基業及深厚文化，國民政府定都後，為紀念其功績，便定每年清明日為「中華民族掃墓節」，意在使全國人民永遠對黃帝表示敬意。清明節向為民間舊俗，每當這一天都須掃墓祭祖表追念祖先意義，清明節改為民族掃墓節是繼承固有宗族觀念而表示崇敬祖先的至意，擴而追念民族遠祖，以發揚民族道德，增強民族自信。而今日神州陸沉，只能遙祭先靈。追念遠祖，應以最虔誠心情和嚴肅態度，宣誓於遠祖先民之前，痛下決心光復河山，解救同胞，負起繼往開來之責。⁵⁴

此外，劉世昌於1955年出版的《中華民國節日誌》，謂紀元前4609年黃帝即建立國家號為中華，建都逐鹿、統一中國，中華民族的國家基礎於焉奠定。官方定清明為民族掃墓節，一方面在表彰黃帝功績，一方面即由於清明掃墓是民間習俗，今日在民族掃墓節掃墓祭祖，更應為民族盡大孝，而報答祖宗的唯一方式，只有反共抗俄、重光河山。⁵⁵

如上所述，早期的節日手冊很簡單地呈現了黨國體制下對傳統慣

53 內政部令臺（89）內民字第8962562號，〈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3條、第5條條文〉，《行政院公報》7卷2期，民國90年1月10日，頁76-77。

54 興漢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紀念節日手冊》（臺北市：興漢出版社，民國42年），頁83-84。

55 劉世昌，《中華民國節日誌》（臺北市：新聞資料供應社，民國44年），頁61-62。上引兩書中有關黃帝建立國家或即位的時間有所出入，在本文不針對此進行考證。

習清明節所賦與的政治意義。首先，是順著原來崇敬祖先的意義，與民族掃墓節表彰黃帝之意義作結合。遷臺以後，在反共復國的時代氛圍中，又進一步以「移孝作忠」之道德觀念，達到「反共抗俄重光河山」之政治宣傳目的。

相關論述一方面突顯國民黨政權重視民族精神、崇尚忠孝的治國理念，一方面也必須藉此節日揭露共產政權的「邪惡本質」。圖1是1952年民族掃墓節期間，《中央日報》所刊一幅名為〈共匪如此「掃」墓〉的漫畫，內容諷刺共匪的掃墓步驟是挖墓奪棺、砍木造槍、犁墳為田、焚骨成灰、骨灰獻俄。⁵⁶以眼



共匪如此「掃」墓
藍戈壁作

圖1 藍戈壁（繪）：「共匪如此『掃墓』」，《中央日報》民國41年4月5日，版6。

目可見的漫畫形式，以國民黨觀點向無法親睹中國大陸現況的臺灣民眾傳達共產政權喪盡人倫，為俄作帳的邪惡本質。

1964年7月，《時事週報》「匪情分析」有一文，引述《人民日報》報導指「共匪」在「大陸匪區」大肆宣揚清明掃墓是迷信觀念和資產階級思想作怪，規定為了「移風易俗」，該年清明節不許民眾去掃墓。藉此斥責共匪要徹底消滅民族思想和倫常觀念。⁵⁷

這段文字，很明顯地是一種斷章取義的政治宣傳。中國共產黨政

56 藍戈壁，〈共匪如此「掃」墓〉，《中央日報》民國41年4月5日，版6。

57 鐵幕透視，〈不許「清明」上墳掃墓〉，《時事週報》8卷1期，民國53年7月3日，頁8。

權早期曾將清明節定為烈士節，當日追悼該政權定義下的革命先烈，⁵⁸ 檢視1964年4月10日《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並非如國民黨所宣傳，單純地要「徹底消滅民族思想和倫常觀念」，而是摘錄了各大報相關報導，表示人民在清明節中懷念革命先烈、紛紛為烈士掃墓等活動極有意義，但清明節中的迷信成分應該破除，清楚的階級意識應該保持。全文內容如下：

踏青和掃墓

羊城晚報四月三日發表一篇短文，漫談清明踏青和掃墓。文章認為，在春光明媚的時刻，利用假日結伴郊遊，或者下鄉“采風學稼”，這樣的踏青很有意思，是值得提倡的。至於掃墓，文章說，雖然我們是無神論者和無鬼論者，明知道人死是不能復生的，也決不相信有所謂“靈魂”的存在；但是一個人，只要他是正直的勞動的人，生前少不了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後人思念他們的創業辛勤，借此清明時節，以鮮花一束，表示一下心意；這是一種紀念活動，我們是不反對的。然而，有些人，他們相信有鬼，相信死人仍在陰間生活著，要享受人間煙火，因此在掃墓的時候大燒元寶蠟燭和金銀衣紙。這是一種迷信思想在作怪，而且是鋪張浪費，我們是要反對的。解放日報四月三日的文章還說，神鬼觀念還會模糊階級意識。目前有些人把掃祖先的墓看作是單純個人私事，不管死者生前是流氓惡霸，還是地主、反革命分子，每逢清明都要照例上墳祭掃，還認為這是“人之常情”。這種丟棄階級觀念、不分敵我的掃墓不是很有害嗎？

58 洪長泰，〈生與死的節日：中共的通俗政治文化〉，收入氏著，《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市：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5月25日初版），頁287 - 288。

花圈和錢紙

湖北日報的一位讀者問：“既然可以獻花圈，為什麼不可以燒錢紙？”四月四日的湖北日報答道：獻花圈和燒錢紙不能相提並論，它們的根本區別在於相信不相信有鬼。獻花圈只是一種紀念儀式，並不是假定死者有“靈”才對他獻花圈的。燒錢紙就不然，是先相信有鬼，相信鬼還要錢用，才去燒它。紀念死者，和相信死者有“鬼魂”，是毫不相干的兩回事情。無神論者並不相信死者還有靈魂，但這並不妨礙他去紀念死去的同志和親人，就是在死者面前宣誓或提出保證，也並不是相信死者真能聽到，只是表示自己繼承遺志罷了。紀念死者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我們反對的只是迷信、有鬼論和唯心主義的觀點。所以說，花圈和錢紙的問題，實際上是有鬼與無鬼的問題，唯心與唯物的問題，要首先把這條重要界線弄清楚。⁵⁹

簡言之，這篇倡導「移風易俗」的文章雖然是從「無神無鬼論」、「唯物論」、「階級觀念」等意識型態觀點立論，但並未否定清明節中紀念亡者的意涵，並且又進一步指出紀念亡者最好的方式是以一束鮮花致敬，而非迷信地焚燒紙錢。此外，也強調掃墓中的神鬼迷信可能會模糊階級意識，使民眾「不分敵我」連大地主和流氓的墓也掃。雖然該文充斥特定意識型態，但在「移風易俗」這層意義上所指出的陋習和應有改良，則不無道理。該文並不易直接導出如國民黨所稱的是要消滅民族思想和倫常觀念等結論，兩者之間存在的差異，顯然是選擇性呈現的宣傳策略所致。

59 〈移風易俗動“清明”〉，《人民日報》1964年4月10日，版2。

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移风易俗话“清明”

今年清明节，各地人民怀念革命先烈，纷纷为烈士扫墓，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许多青少年在烈士墓前和纪念碑前，举行各种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表示决心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为了破除清明节的一些迷信风俗，解放日报、南方日报、湖北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报纸，分别从相同和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议论。这些议论认为，清明是我国二十四节中的一个，正是开始春耕大忙的时候，人们应该趁此大好春光，奋发精神，努力生产；对清明扫墓、踏青、寒食、插柳等风俗习惯，要破除其中的迷信观念，要提倡有利生产、有益身心新风尚。

踏青和扫墓

羊城晚报四月三日发表一篇短文，漫谈清明踏青和扫墓。文章认为，在春光明媚的时刻，利用假日结伴郊游，或者下乡、采风学稼，这样的踏青很有意思，是值得提倡的。至于扫墓，文章说，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和无鬼论者，明知人死是不能复生的，也决不相信有所谓“灵魂”的存在；但是一个人，只要他是正直的劳动的人，生前少不了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后人思念他们的创业辛勤，借此清明时节，以鲜花一束，表示一下心意；这是一种纪念活动，我们是反对的。然而，有些人，他们相信有鬼，相信死人仍在阴间生活着，要享受人间烟火，因此在扫墓的时候大烧元宝、蜡烛和金银山纸。这是一种迷信思想在作怪，而且是铺张浪费，我们要反对的。

解放日报四月三日的文章还说，神鬼观念还会模糊阶级意识。目前有些人把祖先的墓看作单纯个人私事，不管死者生前是清浊善恶，还是地主、反革命分子，每逢清明都要照例上坟祭扫，还认为这是“人之常情”。每逢清明都要照例上坟祭扫，还认为这是“人之常情”。这种丢弃阶级观念、不分敌我的扫墓不是很有害吗？

花圈和钱纸

湖北日报的一位读者问：“既然可以献花圈，为什么不可以烧钱纸？”四月四日的湖北日报答道，献花圈和烧钱纸不能相提并论，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相信不相信有鬼。献花圈只是一种纪念仪式，并不是假定死者有“灵”，才对他献花圈的，烧钱纸就不然，是先相信有鬼，相信鬼还要用钱，才去烧它。纪念死者，和相信死者有“鬼魂”，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无神论者并不相信死者还有灵魂，但这并不妨碍他去纪念死去的同志和亲人，就是在死者面前宣誓或提出保证，也并不是相信死者真能听到，只是表示自己继承遗志罢了。纪念死者是没有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反对的只是迷信，有鬼论和唯心主义的观点，所以说，花圈和钱纸的问题，实际上是有鬼与无鬼的问题，唯心与唯物论的问题，要首先把这条重要界线弄清楚。

“寒食”和插柳

寒食节，是纪念春秋时代晋国介子推的日子，相传要冷食几天。寒食插柳，原是古代春天钻榆柳取火的象征，后来附会为避邪驱鬼的迷信活动。因为寒食只在清明前一两天，寒食和插柳又逐渐成为清明的风俗。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撰文说明了这种旧风俗形成的经过。南方日报四月五日的文章说，这些习俗的形成，是以“灵魂不灭”的思想和封建意识做基础的。寒食节叫人不烧火煮饭做菜，要吃几天冷东西，分明是一种陋习，曹操也早已严令禁止了。倘若每逢清明节都来纪念那个贤臣，介子推，就很难看出有什么现实意义。文章说，相信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和科学文化知识普及，这种陋习将会被彻底破除。

新民晚报四月一日刊登了上海杨浦区区长白街道内江新村里委会关于清明不折柳的倡议。倡议说，有些居民在清明节前，定要采一些杨柳条，戴在自己或孩子的头上，据他们说：“清明戴杨柳，来世有娘舅”。清明不戴柳，来世变黄狗。这些迷信的旧风俗，不但影响人们思想的健康发展，每年对树木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因此，我们要广泛宣传清明不采、不戴杨柳的道理，加强对树木的保护，培养勇于移风易俗的好风气。

圖2 〈移风易俗话“清明”〉，《人民日报》1964年4月10日，版2。

在臺海兩岸兵戎相向、執政者宣示軍事行動隨時展開的年代，民族掃墓節確是激化民眾反共情緒的一項工具。官方時常合併於民族掃墓節舉行追悼大陸死難同胞大會，會中由死難者在臺家屬報告忠烈事實，控訴共匪暴行。⁶⁰1956年，《中央日報》記錄了追悼會中家屬們對共產中國的控訴，記者描述在場許多人未曾到過大陸，這些炎黃子孫在異族蹂躪五十年回歸祖國後，卻因祖國陷於赤匪，使得他們無法回

60 本報電，〈今民族掃墓節 各地遙祭黃陵 追悼大陸死難同胞〉，《中央日報》民國45年4月5日，版5；〈昨天是民族掃墓節 各地遙祭黃陵 追悼大陸死難同胞〉，《中央日報》民國45年4月6日，版5。

到由來所自的大陸瞻仰黃陵，「失望在他們心中燃起復仇的火。」⁶¹相對於該文對臺灣本地族群的描寫筆觸，蘭蓀則在另一篇報導中感嘆：觀滿山盡是掃墓人，而大陸來臺的人們逢此佳節卻無法回家祭祖，對於故國河山的追思實更加深心頭的敵愾。⁶²在這樣的筆觸下，無論是本省或外省族群，大家都有一定要回到大陸以遂民族掃墓節心願的理由。

文革期間，中共對傳統文化進行全盤否定及批判。1966年，內政部長連震東在代表總統主祭時控訴：共產政權取消黃陵祭典，沒有人性，連祖宗也不要了。⁶³與文革相對者，則是黨國官方策動下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作為政策的一環，1972年民族掃墓節正式成為國定假日。《中央日報》社論寫道：「正在大陸毛共匪幫滅絕倫理人性，搞得鬼哭神號之時，我們高舉復興民族道德大纛，無異是又一次傳檄討伐，在這一精神戰線上向赤色反動者浩蕩進軍。」文中強調國民黨政權重視人倫秩序，對比出中國文革剷平墳墓等暴行，也建議今後遙祭黃陵儀式應廣納社會各界參加，以弘揚民族道德，激發反共氣節。⁶⁴期間另有署名孟谷的投書，提及政府規定民族掃墓節休假，是具有人情的措施，可提倡「慎終追遠」。反觀竊據大陸多年的毛共匪幫，卻驅策青年反抗師長，誘逼兒童背叛家庭，更強令人民挖祖墓、焚遺骸，將數千年的中國文化連根剷除。在明顯的對比下，真偽政權的高下優劣也就涇渭分明。⁶⁵1973年，媒體報導歷年來臺的中國大陸人士約二百餘人舉行「民族掃墓節座談會」，主持人表示，政府明定民族掃墓節便利人民回家掃墓，是充分發揚中華民族崇向倫理的固有道德，反之大陸所有祖墳都被中國人民的死敵共匪所摧毀，我們應向全世界揭發共匪不要倫理文化的罪行。⁶⁶

61 王理璜，〈淚眼弔神州〉，《中央日報》民國45年4月6日，版5。

62 蘭蓀，〈觀音山看掃墓〉，《中央日報》民國45年4月6日，版5。

63 中央社電，〈省垣北市各界 昨遙祭黃帝陵 連震東斥共匪忘祖 悍然廢除祭陵典禮〉，《中央日報》民國55年4月6日，版3。

64 社論，〈從道德復興看民族掃墓節〉，《中央日報》民國61年4月5日，版2。

65 孟谷，〈民族掃墓節〉，《中央日報》民國61年4月3日，版11。

66 本報訊，〈掃墓節義胞代表會談 共匪摧毀祖墳 罪行萬惡不赦〉，《中央日報》民國62年4月6日，版3。

1975年蔣中正逝世後，就《中央日報》上所見而言，民族掃墓節的新聞內容及數量在嚴家淦和蔣經國時代漸趨於制式及減少，配合「反共復國」的政治宣傳幾希。事實上，在官方定蔣中正忌辰為國定紀念日於民族掃墓節合併舉行後，當日的重頭戲便為先總統蔣公逝世中樞紀念、各界追思集會和慈湖謁陵等活動所取代，官方對清明節的運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三）政治權力介入下的常民習俗

民族掃墓節提供一個很好的視角，讓我們理解黨國體制下官方權力如何選擇、運用常民習俗，以求達到政治目的。此節日源自清明掃墓祭祖習俗中的慎終追遠意涵，在設立之初就背負國家整合，或提振民族精神之工具性，是執政者刻意經營政治儀式作為。國民黨來臺後，這個節日原有意涵又在反共復國大義及民族偉人塑造下被強化，配合一波波的政治動員及政策調整，顯出重要性。這皆是因為，國家權力認知到這項常民習俗是「有用的」。

戰後臺灣長期在準備反攻的時代背景下，官方時常以「戰時節約」為由，要求民間停止「無謂的」浪費鋪張，按理同樣在「戰時節約」的指導原則下，政治性節日的儀式活動應當也要減少鋪張，然而參考1955年《臺灣省政府公報》的命令及《宣傳週報》的檢討資料，就曾指出民間拜拜已加限制，現在可以進一步節約者在民間者甚少，但各機關團體主持之紀念慶祝集會，反多藉故鋪張，糜費不貲，有違節約意旨且予民間不良印象，應當比照民間習俗節約，力求簡單莊嚴、以節糜費。⁶⁷這正好點出當時統治階層要求民間節約，但舉行政治性節日卻時有藉故鋪張的現象。無論這種鋪張是否進一步改善，但綜觀官方在歷年國慶大會的動員排字、遊行，總統華誕日全國機關搭建壽堂等作法，可知浪費與否？鋪張與否？無謂與否？都是由國家權力定義的，有助於愛國精神、領袖崇拜、反共意識之提升者皆非浪費，無助於此者都成為

67 臺灣省政府令／通知（44）府社三字第96821號：〈為各種紀念節日慶祝集會應力求簡單莊重一案，令仰遵照／特此通知，並飭屬遵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4年秋字74期，頁956；宣傳業務：〈機關團體 加強節約〉，《宣傳週報》6卷13期，民國44年9月23日，頁20。

「戰時節約」的掃除對象。

與其他民俗節日比較，可知清明在國民黨認知下，確有其特殊地位。在名分上它先後獲得民族掃墓節、先總統蔣公紀念日等官方認定或加冕，在實質上它較其他民俗節日更早獲得官方列為國定節日。然而，我們必須瞭解這是一種政治建構過程，而其動因是來自該節日傳統意義符合執政者需求。

（四）與蔣中正逝世紀念日合併舉行

過去蔣中正自我參與造神過程，逝後其誕辰及逝世紀念日則成為後繼者宣示統治正當性的一項資源，就如同先前他利用孫中山的紀念日來點綴自己的統治正當性一般。尤其是逝世紀念日，因為與清明掃墓、盡孝思親等意象結合，使得對自家祖先的祭祀、對中華共祖黃帝的遙祭，以及對民族救星蔣中正的追思，種種意象疊合在一起。

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日定於民族掃墓節合併舉行，然民族掃墓節乃隨著農曆節氣的清明日變動，不一定固定在國曆的4月5日。蔣中正去世隔年的清明日恰巧為4月4日，民間有不少依常理將蔣中正忌日認知為4月5日的現象，為此官方曾特別澄清已明定民族掃墓節為蔣公逝世紀念日，一切紀念活動都應配合在該日舉行。⁶⁸

1976年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於民族掃墓節（4月4日）舉行，中樞紀念於國父紀念館集會，由嚴家淦總統主持，蔣宋美齡在蔣經國攙扶下進入會場。總統致詞後，由大專青年獻誦紀念詩。下午，黨政首長前往大溪慈湖恭謁蔣公陵寢。蔣宋美齡則在蔣經國夫婦陪同下於上午謁陵。⁶⁹大批民眾聚集國父紀念館，據《中央日報》報導，許多民眾在民族掃墓節當日已在至郊區掃墓之前先至國父紀念館行禮，亦有祭祖過後專程到國父紀念館鞠躬的群眾，在報導中他們表示：「以後每年我們都會來，因為有總統 蔣公的領導，使臺灣成為安定繁榮的反共

68 本報訊，〈明年四月四日清明節 為 蔣公逝世週年〉，《中央日報》民國64年12月30日，版3。

69 《中央日報》民國65年4月5日，版1。

基地，我們才有祖先的墳可掃。」⁷⁰

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日與民族掃墓節合併舉行後，逝世紀念大會和至慈湖謁陵的人潮，報導之盛況遠勝遙祭黃陵的簡短記事，成為當日重要的一個集體紀念行為。1979年4月，立法委員黃玉明等以書面質詢向行政院提出：

先總統 蔣公逝世於民族掃墓節， 蔣總統遺囑以發揚民族孝道消滅共黨，匪黨內闖天安門起亂於民族掃墓節，其中大有天意民心所在，正是 蔣公遺囑應驗在匪黨身上；復從大陸人民遙弔蔣公逝世之喪，函託清明應作之事，益證蔣公逝世之日，正是救民族復興道德之意。我們繼承數千年道統產生五權憲法的法統，從法統產生三民主義的政統，正統主要任務在發揚孝道，唯持孝道能統一臺灣大陸與海外人民的反共思想，唯持孝道能實行三民主義消滅匪黨。此種天意民心，政府應知機而作。

他們建議正名尊蔣中正為中華民族領袖，策動在臺灣人民遙祭大陸各姓氏祖先暨殉難同胞，宣導人民奉行三民主義是對國父與領袖懷德，對民族盡孝。⁷¹這項提案雖未實施，但「中華民族領袖」稱號與「中華民族共祖」有幾分雷同。即便在當時並無以蔣中正取代黃帝之議，不過從當日各項紀念活動的偏重，可以看出這種傾向確實是被實踐的。

另一方面，蔣經國在此一天的演出也值得一論。在蔣中正逝後近十年的時間，每逢誕辰或逝世日蔣經國都會發表感性的紀念專文追思父親。以逝世紀念文為例，1976年逝世週年發表〈梅臺思親〉，寫自己獨坐在桃園角板山梅臺追憶父親，想到領袖的精神志事可說是國父後第一人，而其仁政愛民，確是畢生貫徹。而自己將以追隨領袖的腳步奮鬥報親恩，慰父靈。⁷²1977年發表〈其介如石〉，蔣經國自述該年

70 本報記者集體採訪，〈肅穆的紀念堂 一片飲泣之聲〉，《中央日報》民國65年4月5日，版3。

71 本報訊，〈立委聯名提出建議 尊先總統 蔣公為中華民族領袖〉，《中央日報》民國68年4月5日，版3。

72 蔣經國，〈梅臺思親〉，《中央日報》民國65年4月4日，版2。

春初訪問馬祖時，仰視巨石上鐫刻著蔣中正題「其介如石」的手墨，就聯想到父親革命一生的偉大人格和精神，父親的偉大思想、精神、德業、人格，實在是和歷史、國家和民族有著不可分的關係，而自己一生都在父親的慈暉教澤中。自己今後當對黨國盡忠孝之心，以不愧為一中國國民、中國國民黨員，亦不愧為蔣氏之後人。⁷³1978年逝世三週年又為一文〈風木孝思〉，蔣經國坦言父親逝世三年以來，自己皆在悲痛哀思中度過，是一生中最長的日子。又述父親逝世以來，每自省察於國於黨貢獻既少，且實踐篤行更有不足，但是年事日長，報國之心與年俱增，但父親曾以為：「孝莫大於尊親，其次曰不辱。所謂尊親，謂發揚光大吾祖先黃帝之遺緒；所謂不辱，謂當勿貽父母以隕越之差。」蔣經國以此自勉，今後唯以犧牲奉獻之心，為國為黨奮鬥，有生之年盡力於斯，才能得「大孝終身慕父母」之義。⁷⁴1980年逝世五週年，為文〈回顧苦難而充滿希望的五年〉指國際地位雖遇重挫，但中國人的「民族定力」使得國際人士不敢低估，這種定力是淵源於民族情感和文化，其體現就是以「仁愛」為出發點，民族文化中政治哲學的淵深至誠，遠超過現今一般人所說的人權主義，國父一生「無所不容，無所不恕」、蔣公一生「我無政敵」、「不是敵人，就是同志」，但唯有在革命與叛逆之間、大是與大非之間，絕對不容混淆。自己對蔣公「堅守民主陣容」的遺命，決不會有任何遲疑。吾人當在這同為民族掃墓節的前夕，感念「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發揮民族定力。⁷⁵1982年逝世七週年，蔣經國發表〈七年思慕的信念〉，推崇蔣中正天性純孝，把「忠」、「孝」二字推進到崇高境界，認為「孝」始於事親，擴於報國，終成於立身，使孝、忠昇華合一，塑造偉大人格。蔣經國憶及過去和父親種種，又想到目前處境，表示將承繼父親遺志實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業。⁷⁶1985年十週年紀念，蔣將

73 蔣經國，〈「其介如石」——父親逝世兩週年紀念文〉，《中央日報》民國66年4月5日，版1。

74 蔣經國，〈風木孝思〉，《中央日報》民國67年4月5日，版1。

75 蔣經國，〈回顧苦難而充滿希望的五年〉，《十年風木》，頁135 - 140。

76 中央社電，〈今為蔣公逝世七週年 蔣總統發表紀念文 誓言達成復國使命〉，《中央日報》民國71年4月5日，版1。

過去所發表的各種追憶文集結成《十年風木》一書，在卷首為文〈十年風木懷永不忘〉自承十年以來皆恃國父之主義與父親之遺命為指引，彙為此書一則置之硯右以自箴自砥，一則備諸同志同仁作為相勉印證。⁷⁷

與其他簡短的光復節、國慶日獻詞、談話相比，蔣經國這些紀念文雖然語調感性，但篇幅之長、濫調之多，令人聯想到過去蔣中正所發表的各種冗長的節日文告。未如其父於國定節日發表長篇大論的蔣經國，在自己父親紀念日的操作上，反而顯得極為費心。蔣經國歌頌國父和領袖，並且在此一表態下，自我標榜為後繼者，排入偉人接班梯隊。

表1：蔣經國於蔣中正逝世紀念期間發表文章一覽表

文章篇名	撰文時間及目的
守父靈一月記	1975年4月5日至5月5日 蔣中正逝世期間月記
梅臺思親	1976年3月8日 蔣中正逝世週年紀念文
其介如石	1977年4月3日 蔣中正逝世兩週年紀念文
風木孝思	1978年4月5日 蔣中正逝世三週年紀念文
回顧苦難而充滿希望的五年	1980年4月3日 蔣中正逝世五週年紀念文
七年的思慕和信念	1982年4月5日 蔣中正逝世七週年紀念文
十年風木懷永不忘	1985年4月4日 蔣中正逝世十週年《十年風木》卷首紀念文

資料來源：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2冊（臺北市：行政院新聞局，民國80年5月初版）；蔣經國：《十年風木》（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4年5月3版）。

蔣經國的這些追思，曾被選入國民教育教材中，⁷⁸其後由官方背景的出版社整理出版，教育部甚至透過省政府教育廳，向學校宣傳推

77 蔣經國，〈十年風木懷永不忘〉，收入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2冊，頁606 - 607。

78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函（65）610教四字第42199號：〈「請通知貴屬國民中學及私立初中，將國文課本蔣院長著「守父靈日記」中第二段更正。」〉，《臺灣省政府公報》65年夏字62期，頁3。

銷。⁷⁹關於這個儀式行為，除了是身為人子的真情流露外，尚應回到當時的社會脈絡，去檢視其政治意義。當時臺灣雖標榜自由民主，但實質的政治施作仍為強人威權，以領袖意見為依歸，蔣中正死後，雖在既有法統下經過嚴家淦繼位的緩衝，而呈現出尊重憲政體制之表象，但是隨後蔣經國接班過程卻未出現任何權力競逐現象，與一般認知的民主政治相去甚遠，這當然與早在蔣中正時代就已確立接班人選有關，也印證了當時家父長制的權力結構性質。

若以這種視角觀察其感性行為，當能解讀出更深含意。那可能是昭告世人自己將繼承父志，是一種宣示統治正當性的表現。如果說蔣中正在種種節日文本中強調的個人功業，可以相當程度為其獨裁統治背書，那麼尚無顯著功績的蔣經國又能夠用哪些事蹟來為獨裁統治背書？在父死子繼的權力結構下，以父之名制定偉人紀念日，在節日中向父親示愛、繼志的表態，持續強化國民革命等歷史記憶，似乎都可理解為其統治策略之一。

現下臺灣社會一般的認知裡，蔣經國平易近人、親民愛民、不搞個人崇拜的形象似乎極為鮮明。比較這些統治宣示和實際作為來看，可知蔣經國雖不搞明顯的個人崇拜，但仍藉由這種表達人子之孝的儀式行為，向人民傳達應為國家、為黨、為領袖盡忠的意念，而這種對集個人先父、本黨總裁及國家領袖三種身分於一身之蔣中正所展開的公開追憶，背後應該也存在著自我正當化意圖。上述種種，形塑出蔣中正逝後民族掃墓節中的一幕風景。

肆、90年代以來民族掃墓節的變貌

在政治權力與常民習俗混合下形成的民族掃墓節，解嚴以後在臺灣社會日益民主化及本土化的趨勢下，所反映出來的明顯轉變就是國

79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函67教二字第25993號：〈「黎明文化公司將蔣院長手著三書合印成冊定名「慈湖孝思」，並於二月出版，各級學校如需該書，可逕向該公司洽購。」〉，《臺灣省政府公報》67年春字70期，頁5。

家權力干涉的和緩以及人民娛樂休息的權益漸受重視。

1992年，部分縣市長要求將每年3月29日革命先烈紀念日的春祭國殤及清明日民族掃墓節的遙祭黃陵合併於3月29日一日舉行。他們的理由是，每年省及各縣市均在當地忠烈祠舉行春祭國殤與遙祭黃陵，然兩項祭儀時間僅相隔一週，而遙祭黃陵當天適為民族掃墓節，部分人員因須參與遙祭黃陵典禮，致未克返鄉祭祖掃墓。而與祭人員依例均由學校指派代表參加，因適逢春假期間，校方也感困擾。內政部當時針對該事的函覆是，兩項祭祀各具意義，不宜合併或偏廢。⁸⁰但官方思維在日後便展現變通，1997年4月，民族掃墓節當日的蔣公逝世紀念中樞儀式，發生官員出席率不佳的冷清現象，這是因為碰上清明節連續假期，許多官員及民意代表都請假返鄉掃墓或拜訪基層所致。有媒體評論時代已有所不同，對於過去威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儀式文化」應有所調整。⁸¹此次總統府方面明確回應，於該年年底要求行政院重新檢討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的紀念方式，隔年由內政部通過修正，一併取消「以集會方式紀念或慶祝節日」的硬性規定。⁸²1998年，中樞遙祭黃陵也選擇在民族掃墓節前日舉行，內政部官員對此表示，這次調整是為了便利民眾安排祭祖活動而作的。⁸³2001年週休二日制全面實行，民族掃墓節和其他民俗節日在不妨害民間作息的考量之下，成為仍然保留休假的節日之一。⁸⁴由上述可知，在這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清明節氣這天漸漸褪去政治色彩，回歸清明祭祖的民俗本質。

2000年後，以臺灣主體意識為統治理念的民進黨政權下，高度象徵中華國族主義的遙祭黃陵儀式亦面臨一波檢討聲浪，其中較大者發生在執政後期的2007年。該年民族掃墓節前夕，考試院院長姚嘉文等人

80 唐福春，〈春祭國殤 遙祭黃陵 兩項祭祀不宜合併舉行〉，《聯合報》民國81年5月22日，版5。

81 張慧英，〈儀式文化 可以休矣〉，《中國時報》民國86年4月6日，版2。

82 內政部令臺（87）內民字第8706459號：〈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3條、第5條。〉，《內政部公報》4卷5期，民國87年11月16日，頁19-22。

83 陳邦鈺，〈中樞遙祭黃帝陵 三百餘人參加 典禮莊嚴肅穆〉，《中央日報》民國87年4月5日，版2。

84 內政部臺（89）內民字第8962562號令：〈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3條、第5條條文〉，《行政院公報》7卷2期，民國90年1月10日，頁76-77。

呼籲取消中樞遙祭黃陵典禮時表示：「很多臺灣人的祖先是原住民而非黃帝。」政府應取消中樞遙祭黃陵，不要干涉人民祭祖。歷史學者鄭欽仁亦說：「黃帝始祖」一說是為突顯「中原文化一元論」和「中華帝國大一統」的神話，自漢以後歷朝以此宣示正統，甚至今日中國還想藉之合理化併吞臺灣的野心。遙祭黃陵是過去的威權遺緒，現代觀點可從「傳說系統」或「神話學」角度作研究，但若以堂堂國家大典、動員百官規格遙祭，實在荒謬。⁸⁵《自由時報》亦發表社論，指所謂中華文化正統論只是特定時期的歷史論述，背離文化多源的事實，在臺灣祭黃陵是「拜錯公媽」的行為，尤其在民主的今日，國家主權無關血緣正不正統，因此更應廢除。甚至過去官方和現在國民黨仍大肆舉辦的「祭蔣」儀式，亦應歸於蔣家後人，把清明還給民眾。⁸⁶

同年8月，民進黨政權推動「去蔣化」時廢除蔣中正相關紀念日，有媒體誤報為政府將要廢除清明節或民族掃墓節，將之與「去中國化」等同視之，⁸⁷為此，內政部長李逸洋出面說明，蔣中正逝世當日為4月5日，而民族掃墓節或清明日則依每年節氣而定，因兩節日向來合併舉行，所以才遭致誤解。⁸⁸對照過去國民黨政權在蔣公逝世紀念和民族掃墓節上的附會操作，再看此次去蔣化時引發的誤解，不能不說這多多少少是過去黨國體制思維在社會認知中所餘留下來的影響之一。

同一時期，中國則在國勢強大的背景下，進一步強化中華民族精神。例如有關清明節的休假，中國政府考慮到西風東漸，民眾熱衷慶祝西洋節日卻忽視中國傳統節日的現況，於2007年12月7日由國務院常務委員會議作出相關決定，修改「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取消五一勞動節的連假，列入過去不被定為假日的端午、中秋及清明等，成為新的國定節日，並於2008年開始實施。⁸⁹

在與意識型態有關的黃陵祭祀上，則與同時期臺灣相反地，將之

85 范正祥，〈中樞遙祭黃帝陵 姚嘉文籲廢〉，《自由時報》2007年4月5日。

86 社論，〈清明祭祖應回歸民間私人領域〉，《自由時報》2007年4月7日。

87 許建榮，〈去蔣去清明？〉，《自由時報》2007年4月7日。

88 羅添斌，〈追求轉型正義 國家紀念日去蔣〉，《自由時報》2007年8月30日；林修卉等：〈廢啦！蔣公紀念日以後沒了〉，《中國時報》民國96年8月30日，版A4。

89 新華社，〈國務院關於修改《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的決定〉，《人民日報》2007年12月17日，版2。

發展成一個華麗的祭典。1948年共產黨「解放」陝西黃陵縣後，成為該年度祭黃陵的唯一主角。⁹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祭黃陵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是陝西省的省級祭祀，1960、70年代間因文化大革命長期中斷，80年代起才又恢復為省級祭祀，從相關文獻中，可見官方參與祭祀者主要是陝西省及黃陵縣人民政府、政協之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時期發行的各式出版品中，編纂者對1963年至1978年間祭儀的中斷，僅以「未進行祭祀活動」一句話輕描淡寫。⁹¹90年代，祭黃陵由省級祭祀往更見開放性的公祭發展，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一類中央級官員開始出席此一儀式。⁹²1997年至1998年間，中國為迎接香港、澳門回歸及大型清明祭祖活動而開始大規模整修黃帝陵，⁹³以黃帝為題舉辦研討會。⁹⁴2000年，媒體報導中國官方在黃陵軒轅廟東側，先後於1998、2000年清明節樹立香港回歸紀念碑及澳門回歸紀念碑，而周圍還留下一處空位。當地官員表示：「這是為臺灣統一紀念碑預留的。」⁹⁵2004年起這項儀式一反過去的簡單樸素，添加古典樂舞的表演元素，升級成為一場華麗的盛演。⁹⁶中國國族主義對祭黃陵的運用升高。2005年，祭祀期間於西安另舉辦「黃帝祭祀與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邀集學者討論祭祀黃帝等文化議題。⁹⁷2007年公祭黃帝陵籌備單位表示將向全球公開徵求黃帝陵祭文，⁹⁸表現出向全球推銷這項政治儀式的企圖心。

90 李俊領，〈中國近代國家祭祀的歷史考察〉頁177 - 181。

91 陝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等（編），《黃帝與黃帝陵》，頁116 - 128；柏明、李穎科，〈黃帝傳〉（西安市：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頁148 - 166。

92 姚敏傑、何炳武（編注），《黃帝祭文集》，頁95 - 104。

93 孟西安等，〈黃帝陵整修一期工程全面完工〉，《人民日報》1997年3月21日，版5；孟西安，〈黃帝陵整修一期工程完成〉，《人民日報》1998年3月24日，版4。

94 李桂民，〈黃帝祭祀和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華夏文化》2005年3期（2005年9月25日），頁8。

95 王榮久等，〈黃帝陵前動統一——黃帝陵“澳門回歸紀念碑”揭碑紀實〉，《人民日報》2000年4月11日，版12。

96 李耀宗，〈論“黃帝”界說與黃帝精神——兼談陝西黃陵甲申“中華大祭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卷2期（2005年3月15日），頁64 - 74。

97 李桂民，〈黃帝祭祀和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華夏文化》2005年3期（2005年9月25日），頁8 - 10；宋曉夢，〈慎終追遠 繼往開來——黃帝祭祀與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夏之卷（2005年5月28日），頁179 - 180。

98 大陸新聞中心，〈公祭黃帝陵 首次向全球徵文〉，《中國時報》民國96年7月28日，版A17。

面對著中國「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政治目標，加以臺海兩岸開放局部交流，解嚴以來許多人士或團體慕名而至，⁹⁹許多懷抱中國意識、立場偏向統一的知名政治人士，也抱著一種中華民族認同的追慕心情，在這波過去被稱作是「統戰技倆」的時代氣氛下前往朝聖祭祀，展現個人所認知的，臺海兩岸人民同一根源，將來也應追求統一的政治理念。

伍、結語

有關中華民國成立後被創造出來的民族掃墓節，主要可以有兩個觀察角度。一個是它原來屬於傳統節日，又被施以各種政治運用的特殊性。另外一個，則是祭黃陵這項節日儀式。

首先，這個節日在中華民國的出現，是政治權力針對傳統節日的清明，進行再詮釋、再創造的事例。由於官方看出它的存在有利於統治，因此在眾多同屬傳統的節日中，能夠脫穎而出而受到重視。起初，它雖然不是國定假日，但當國府還未普遍重視傳統節日時，此一節日已經配合清明舉行。政府遷臺後，在戰時節約原則下，官方以浪費、奢侈等由，積極表現出壓抑中元普渡等傳統民俗的態度，但清明則受到重視。在國民黨的政治宣傳下，該節日多了一個反共復國以報祖先的意涵，甚至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背景之下，最終被制定為一個國定假日。這與其說是清明本真的意涵受到重視，不如說是因為它便於官方利用所致。1975年蔣中正逝世後，民族掃墓節進一步與其逝世紀念日結合，在要求全民統一於當日進行的祭祖呼籲下，蔣的民族救星形象被塑造得更加鮮明。甚至2000年後的民進黨政權，欲將蔣中正紀念日廢除時，一度引來了「去中國化」、摧毀傳統的誤解與批評。90年代以來的發展，這個節日原有的祭祖、休息功能愈來愈突顯，在相關法案中，也有將民族

99 姚敏傑、何炳武（編注），《黃帝祭文集》，頁105 - 142。

掃墓節名稱恢復為清明節的討論動向。¹⁰⁰

其次，清末被革命派認為是漢族血緣象徵的黃帝形象，共和成立後不被北京政府重視。1930年代，保守的國民黨當權派，重視清明節中的祭祖要素，將之與中國歷史上賢君明主及民族英雄結合，由國府官員至以黃帝陵為主的各大陵墓祭祖。他們以保守復古的姿態，企圖將黃帝詮釋為中華民族共祖，藉由祭黃陵的風氣帶動，在內侮外敵交逼的情勢下，在思想上強調中華民族血緣同一。

1949年以後，意識型態上與國民黨不同的中共政權，將清明與追悼革命先烈結合，延續延安時代作法，制定「烈士節」。祭黃陵於中國大陸則在一段時期遭到相當的冷落或壓抑。反之，臺灣在黨國體制的蓄意經營之下，保存或創造了執教者所宣稱的，更「正統」的中華文化。儘管時空環境上均有欠缺，至少在官方層次，他們仍蓄意保留在民族掃墓節祭黃陵的「傳統」。

90年代以來，在臺灣社會型態變遷和本土意識提升的背景下，即便儀式本身日漸形式化，遙祭黃陵雖然仍是官方在清明期間的政治儀式之一。不過，其正當性也受到民主化社會中不同聲音的質疑。反之，中國近年不僅將清明定為國定假日，針對黃帝符號也銳意進行一系列的創造、再製。

Eric Hobsbawm曾經提出「被創造的傳統」觀點，指出「傳統」時常出現在社會快速變遷的階段，諸如此類的儀式性行為是對新情境的反應，訴諸真實的或想像的歷史，以便正當化許多社會行動，並且培養社群的團結。¹⁰¹ Anthony D. Smith則提醒我們，這些過程與其說是發明傳統，不如說是在諸多歷史元素中，選擇符合國家或民族歷史、文化及情感的元素，將神話、象徵、記憶作重新組合（recombine）及詮釋（reinterpret）。¹⁰²綜合這兩種觀點及所見事例，可以瞭解所謂「被創

100 仇佩芬，〈未來春節假期 不是6天就是9天〉，《中國時報》民國99年5月21日。

101 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35卷1期（1997年3月），頁260；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 - 2.

102 轉引自陳翠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臺灣政治學會「臺灣政治學會第六屆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1999年12月18日 - 19日，頁4。

造的傳統」大多是在舊有資源、材料上的再製，而非全新的創造。唯有如此，統治者也好，民眾也好，才更能感受其親近性而易於接受。本文正是一個近代中國乃至於戰後臺灣的個案考察研究。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中華民國行政院內政部檔案》（臺北行政院內政部藏）。

0065/B11802/12/0001/008，〈總統 蔣公逝世紀念日案〉。

張豈之編，《五千年血脈——黃帝及黃帝陵史料匯編》。西安市：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陝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等編，《黃帝與黃帝陵》。西安市：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二、文集、日記、回憶錄

邵元冲著，王仰清、許映湖標注，《邵元冲日記》。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姚敏傑、何炳武編注，《黃帝祭文集》。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蔣經國，《十年風木》。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4年5月3版。

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2冊。臺北市：行政院新聞局，民國80年5月初版。

三、期刊、報紙、公報

《人民日報》1964年至2000年。

《大公報》民國26年。

《中央日報》民國23年至民國85年。

《中國時報》民國86年至民國99年。

《內政部公報》民國87年。

《孔教會雜誌》民國3年。

《自由時報》2007年。

《行政院公報》民國90年1月10日。

《宣傳週報》民國44年。

《時事週報》民國53年。

《國民政府公報》，民國17年。

《新中華報》1937年。

《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44年至民國67年。

《聯合報》民國81年至民國81年。

四、專書、研究報告

中國民俗學會、北京民俗博物館（編），《節日文化論文集》。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劉魁立（編），《中國節典：四大傳統節日》。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楊琳，《中國傳統節日文化》。北京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

林美容，《中華民國現行紀念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之研究》。臺北市：內政部民政司委託計畫報告，1996年。

政事堂禮制館編，《民國禮制七種》。北京：編者，民國3年至4年。

柏明、李穎科，《黃帝傳》。西安市：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市：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5月25日初版。

陳正之，《臺灣歲時記——二十四節氣與常民文化》。臺中市：行政院新聞局中部辦公室，民國86年3月初版。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7月2版。

黃麗生，《蒙古意識與中國認同的糾葛：民初外蒙古獨立運動與內蒙古的反應》。臺北市：蒙藏委員會，民國91年6月初版。

鄭欽仁，《歷史文化意識對我國政策之影響》。臺北市：業強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

劉世昌，《中華民國節日誌》。臺北市：新聞資料供應社，民國44年。

興漢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紀念節日手冊》。臺北市：興漢出版社，民國42年。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五、期刊、單篇、會議論文

丸田孝志，〈陝甘寧邊區の記念日活動と新曆・農曆の時間〉，《史學研究》第221號（廣島縣：廣島史學研究會，1998年7月31日）。

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91年9月）。

石川禎浩，〈20世紀初頭の中國における”黃帝”熱—排滿・肖像・西方起源說—〉，《二十世紀研究》第3號（京都府：二十世紀研究編集委員會，2002年12月）。

李俊領，《中國近代國家祭祀的歷史考察》。濟南市：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4月20日。

李桂民，〈黃帝祭祀和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華夏文化》2005年3期（西安市：陝西省軒轅黃帝研究會，2005年9月25日）。

李耀宗，〈論“黃帝”界說與黃帝精神——兼陝西黃陵甲申“中華大祭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2期（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學期刊社，2005年3月15日）。

沈松僑，〈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歷史學報》第37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6年6月）。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收入盧建榮編，《性別、政治與集體心態——中國新文化史》（臺北市：麥田出版，2001年11月27日初版）。

- 宋曉夢，〈慎終追遠 繼往開來——黃帝祭祀與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夏之卷（北京市：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2005年5月28日）。
- 妹尾達彥，〈帝國の宇宙論——中華帝國の祭天儀禮〉，收入水林彪等編，《王權のコスモロジー》（東京都：株式會社弘文堂，平成10年4月）。
- 陳翠蓮，〈1920年代臺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臺灣政治學會「臺灣政治學會第六屆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1999年12月18日 - 19日。
- 羅素玫，〈都蘭阿美人的掃墓節：一個社會文化的變遷與轉換之探討〉，《東臺灣研究》第5期（臺東縣：東臺灣研究會，2000年12月）。
- 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35卷第1期（臺北市：思與言雜誌社，1997年3月）。

Festival and Politics :

The remaking of Ching Ming Festival under KMT regime (1912-2008).

Jyun-yu Jhou*

Abstract

The Ching Ming festival is a cultural property of the East Asia or Ethnic Chinese society in common, but it has an especially legal name in R.O.C. (Taiwan) Which is Chinese Tomb Sweeping Day. In fact, Ching Ming festival and Chinese Tomb Sweeping Day are not equal, even though they are similar. The former is a traditional festival; on the contrary, the later is a political holiday which was created by KMT for their interest. Furthermore, after the death of Chiang Kai-shek, KMT established the Death anniversary of Chiang Kai-shek on Ching Ming festival, coincidentally but also purposely. Therefore, there were three festivals or holiday on the same date.

This article is a cas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g Ming festival from 1912 to 2008,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official literatures, propaganda documents, and organs of KMT, trying to investigate and demonstr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traditional festival, also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hina.

Keywords : Ching Ming Festival, Chinese Tomb Sweeping Day, Ceremonies for Mausoleum of Yellow Emperor, Death anniversary of Chiang Kai-shek, Kuomintang.

* Ph D. Student,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Department of Area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